

“两大工程”二期丛书首发亮相上海书展



我校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工程”和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”(以下简称“两大工程”)二期成果发布暨丛书首发式8月17日在上海书展举行。

“两大工程”二期再结硕果:打造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、集成工程、示范工程

今年5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贺信中强调“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、理论创新、方法创新”。

学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,汇聚学者力量,开展有组织科研,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,积极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。2017年,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,学校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了“两大工程”一期,并于2021年出版了20部学术专著。党的二十大后,学校继续高起点谋划和推进“两大工程”二期工作,将其作为深化部校共建、共同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有力举措。

四年后的今天,“两大工程”二期再结硕果,20部学术专著陆续出版,首发亮相上海书展。组建大团队,构建大平台,承担大项目,展现大成果,是“两大工程”二期的工作思路。成果布局6大系列、36个研究项目,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打造思想矩阵,背后凝聚了学校数十位知名学者、数百人研究团队的心血和智慧。

在二期学术委员会主任吴晓明看来,“两大工程”的持续推进,不仅深化了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,更助力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。对复旦哲学社会科学而言,“两大工程”是实现根本性转折的关键抓手:完成学术化阐释的同时,推动学科彻底摆脱“学徒状态”,确立自我主张,最终形成具有鲜明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新范式。

新起点上,学校将以“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、理论创新、方法创新”为工作指引,将“两大工程”的好做法、好经验坚持好运用好。将继续实施“两大工程”三期,以打头阵、当尖兵的奋斗精神,为上海理论工作、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

部分专著先睹为快

《全球化新叙事: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》从“西方中心”到“多元

共生”,解读全球化新叙事的中国智慧。作为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”的重要成果,这部著作不仅解构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话语,更以中国实践为基,勾勒出了多元包容的全球化新路径。

作者、校特聘教授周文介绍,该书的创作初衷源于对全球化现实困境的深刻关切。作为周文“中国道路三部曲”的收官之作,该书与其此前两部作品共同构成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多维度探索,尽显复旦学者“立足中国、放眼世界”的家国情怀。

《当代马克思主义考古学》以史育人,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。由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陆建松主编、考古学系主要教师集体写作的《当代马克思主义考古学》应时代召唤而生,在内容与结构上打破了传统考古学专著的范式,围绕构建考古发掘研究、传播利用和保护传承“三位一体、前后贯通”的大考古学学科体系谋篇布局,为建设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献上“复旦答卷”。

《科技强国的理论意蕴与多维度》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的理论坐标,由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杨庆峰领衔,在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下,围绕“如何建设科技强国”这一核心问题展开,深入挖掘这一重大国家战略背后的理论内涵。该书具有两大鲜明特色:一是强调科技强国建设的人民指向,将保障和增进全体人民福祉视为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动力;二是洞察科技强国建设与科技伦理之间的深层关联,指出涉及到规范性的科技强国绝非对象化思考下单纯的科学议题。

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》以史学创新回应时代之问,书写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新篇章。作为“两大工程”二期项目,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》自立项起就紧扣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阐释”的宗旨,力求为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学理支撑。

历史学系副教授何爱国坦言源于对这些关键问题的思考。书中首次系统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内在契合性,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找到了文化根基。面对“世界之问”、“学科之问”、“中国之问”,这本书给出了史学答案。

本报记者 汪祯仪
实习记者 潘心诺 黄婕
本报记者 成钊摄

他们共同谱写抗战烽火中的史诗

1931年,“九·一八事变”爆发后,中华儿女投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。在国家危亡之际,从抗战沙场到医疗救护现场,从文化舆论战线到科研救国一线,闪现着无数复旦人的身影。

马相伯:卖字救国

1931年,日本占领中国东北,马相伯奔走呼号,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,这时他已90余岁,在街头写字义卖,筹集10万块钱抗日军费。上海沦陷后,马相伯也走上了流亡之路,在越南谅山时,他为复旦学生写下十二个字——“读书不忘救国,救国不忘读书”。1939年百岁诞辰,国内外贺电如潮,中共中央誉其为“国家之光,人类之瑞”,他却将寿礼悉数捐给抗战伤兵。

复旦学生投身局部抗战

“九·一八事变”爆发,复旦同学自发组建义勇军。1932年寒假期间,义勇军特务连某排在军训教官郭坚带领下前往大场地区,参与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。此外,在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、著名国防化学家林继庸教授指导下,部分师生通过制造炸药等方式支援前线。1932年4月29日,朝鲜义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日军阅兵式上制造爆炸案,所用饭盒形状炸弹,即为复旦同学所制。

梁添成:年仅26岁殉国

在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

烈士公墓中国烈士名单F区,长眠着复旦大学1933级商学院会计系校友梁添成烈士。梁添成为印尼华侨,1929年归国求学。1935年春,他成为中央航空学校第六期学员,毕业后加入空军第4大队,屡建战功。1939年6月11日殉国,年仅26岁。

荣独山:在战场最前线救治无数伤员

1937年,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草创,荣独山历任X光队队长、医务股主任和代理总队长。解放前夕,国民党邀请荣独山、林飞卿夫妇前往台湾,他们拒绝,选择加入上海医学院,后来分别成为了上医放射学和免疫学的奠基人。

孙寒冰:创办《文摘》,为真理而牺牲

1940年5月27日,日寇的飞机呼啸在黄桷镇的上空,夺去了七位师生的生命。他们之中有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、《文摘》月刊的主编孙寒冰。

1937年1月1日,《文摘》月刊创刊。从该刊物发起之初,孙寒冰就一直担任主编,坚持“以‘抗战第一’为宗旨”。1937年8月,《文摘》在国内第一次翻译并刊登了埃德加·斯诺所著的《毛泽东自传》。如今的复旦园中,有一座“寒冰馆”,为这位文化战士留下真挚的纪念。

汤飞凡:研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

1929年,汤飞凡学成归国,赴上海医学院任教,创立了上医的细菌学系。1937年,汤飞凡临危受命,到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,后被任命为处长。1941年,汤飞凡带领团队试制青霉素。1944年,第一批青霉素宣告制成,并获海外认可。中国成为率先制成青霉素的七个国家之一。

陈望道:筹建复旦新闻馆

20世纪30年代,陈望道积极投身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和左翼文艺活动。1942年秋,出任迁至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。任内发起筹建“新闻馆”的倡议,1945年4月5日,新闻馆落成。在陈望道主持下,新闻馆很快成为校内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场所。

梅汝璈:参加远东军事法庭

1946年至1948年,受国民政府派遣,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教授

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,使7名甲级战犯被送上绞刑架。同时,由于他的努力,日本战犯矢口否认的南京大屠杀被写进了判决书。

来源:党委宣传部 校史协会

图片新闻

新校史馆邂逅趣味互动装置



从“百廿光华”序厅到“日日常行”沙盘,均采用充满未来感的数字科技,打造极具科技感的沉浸式场域环境,演绎复旦百廿历史与远景宏图。

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方东妮